

跨文化傳播研究

跨文化傳播中的認知方式對接與調適

陳忠

摘要：跨文化認知方式的差異，給跨文化傳播帶來諸多隱性障礙，制約著文化傳播的效果。跨文化認知方式的對接方式和調適策略，在以往的傳播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大都被忽略。本文將貫穿於中文的“主客和合、背襯優先”的中國式認知方式，跟英語“自我中心、顯體優先”的認知方式進行對比，在此基礎上探尋跨文化認知方式對接的有效途徑，提高文化傳播效果。

關鍵詞：認知方式；客體導向；背襯優先；自我中心；顯體優先

Abstract: Differences in cross-cultural cognitive patterns pose numerous implicit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most of which have been overlooked in previous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sequently, the alignment and adapt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gnitive pattern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Chinese cognitive pattern—characterized by “harmon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Ground-preference orientation”—with the English cognitive pattern, which emphasizes “ego-centrism and figure-preference orientation.” Based on this comparison, the study explores effective methods for aligning cross-cultural cognitive pattern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to enhance its efficacy.

Keywords: Cognitive pattern; Object-oriented; Ground-preference; Egocentric; Figure-preference

一. 文化傳播的瓶頸：跨文化認知方式的對接

文化傳播內容，包括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文化傳播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跨文化認知方式的對接程度。跨文化認知方式的差異，在以往的文化傳播研究中較少得到關注，尚處於探索階段。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以往的文化傳播所關注的，大多是漂浮於水面之上冰山的可見部分，中外認知方式的差異就

像隱沒於水下的冰山若隱若現，雖難以察覺，卻制約著中文跨文化傳播的效果。

二、中國式認知方式對中文和中國文化傳播的制約

“認知方式”是指一種語言或個體基於民族文化的哲學基礎，觀察、組織和表徵世界優先選擇的視角和方式，包括概念化途徑、組織結構式和語序編碼的方式。一種語言在其哲學基礎的誘導下，傾向於優先默認跟其哲學基礎一致的認知方式來認知和表徵世界，形成特定的“認知定勢”。中外認知方式的差異，影響到文化傳播中認知方式的對接程度，並影響到傳播的效果。

影響認知方式最基本的心理基礎，是“顯體-背襯 (figure-ground)”概念。

2.1 漢英“背襯優先”與“顯體優先”認知方式差異

人類的認知過程將認知物件分解為“背襯 (ground)”和“顯體 (figure)”兩部分。顯體是有待於識別的目標，背襯為確定顯體目標提供領屬、屬性、起點、目的、途徑、條件上的參照。

“背襯-顯體”的分工，構成主從結構語序的認知基礎：修飾成分為中心成分提供參照而充當背襯，中心成分作為認知目標而充當顯體。但是，背襯和顯體在漢語和英語中的語法地位不同，導致各自主導語序的不同。漢語以背襯前置為主導語序，英語以背襯後置為主導語序。

2.2 漢英認知定勢差異的動因——哲學基礎

人類的文化形態雖千差萬別，但可以歸結為不同文化對主體、客體關係的取向類型。主要分為“客體導向、主客和合”和“自我中心、主客二分”兩大類型。

根據 Levinson¹，歐美文化的源頭古希臘文明基於“人是度量萬物的尺度”哲學觀，強調自我中心，導致英語以觀察者自身作為主導性空間關係參照框架。陳忠的研究發現²，漢語“客體導向、背襯優先”和英語“自我中心、顯體優先”的認知定勢差異，導致漢英各自優先選擇不同的參照框架表徵時空方向，從而造成漢英時空方向表徵並非完全對應，也是造成漢語姓前置於名而英語相反的原因。

¹ Levinson, Stephen C.,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 Explorations in Cognition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13.

² 陳忠，〈漢英時間方向概念化路徑的差異對比——從認知定勢到文化的哲學理念〉，《當代語言學》，23•2 (2021) : 259-276。

認知方式跟文化模式的哲學基礎保持一致。特定文化的哲學基礎，對應著特定的認知方式。漢語所植根的文化屬於“客體導向、主客和合”型，優先立足於客體自身結構對世界進行概念化和組織表徵，客體的獨立性高於主體，傾向於充當背襯，因而“客體導向、主客和合”哲學理念跟“背襯優先”一致。基於“人是度量萬物的尺度”哲學觀，英語傾向於立足“自我中心、主客二分”的視角觀察、組織、表徵世界，立足於目標對世界進行概念化和組織表徵，目標跟顯體一致¹。

漢英認知方式的差異，不僅影響到姓和名的先後排列順序、語序、論元角色的優勢分佈、折扣計算、敘事方式，而且還影響到時空方向認知等領域²。掌握了這個規律，就找到了打開語言頂層設計的鑰匙，預測跨文化學習者在哪些地方容易出現偏誤，教材和教學設計有的放矢，借助於知己知彼的認知調適，實現文化傳播過程中不同認知方式的精準對接，也有助於從局部規則類推中文的整體規則。

2.3 語序組織的漢英認知方式對接

漢語某些空間方位複合詞的結構順序和英語相反，例如：

漢語	英語
----	----

- | | |
|----------|--------------------|
| (1) 左上—— | top left |
| 左下—— | lower left |
| 右上—— | top right |
| 右下—— | lower/bottom right |
| 右前—— | front right |
| 右後—— | behind/rear right |

左右處於水準方向，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左右水準放置的物體，比垂直的上下方向放置的物體更加穩定，穩定的態勢比不穩定態勢更適合充當參照背襯。而漢語背襯優先前置，所以（1）中漢語和英語表示方位的詞語結構順序如此整齊地彼此逆序。

不同認知方式主導著背襯到顯體的呈現順序先後。在線性語言符號組合序列中，就背襯和顯體的表徵方式而言，漢語傾向於通過背襯看顯體，英語傾向於通

¹ 陳忠，〈認知定勢與論元角色分佈優勢的漢英差異〉，《當代語言學》•1(2025):79。

² 陳忠，《漢英時空方向認知對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33-134頁。

過顯體看背襯。體現為如下順序：

漢語	英語
通過整體看局部	通過局部看整體
三分之一	one third
通過來源看去向	通過去向看來源
他從北京去上海	He goes to Shanghai from Beijing.
通過原因看結果	通過結果看原因
他打球打累了	He is tired from playing basketball.
通過途徑看目標	通過目標看途徑
他坐車去學校	He goes to school by bus.
通過工具、方式看動作	通過動作看工具、方式
他用鋼筆寫字	He writes with a pen.

這些認知方式的差異，影響到漢英組織策略和語序。漢、英兩種認知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優勢語序或主導語序。所謂優勢語序，是無標記的語序，而少數例外是有標記的，要額外付出編碼代價。

單句的主導語序遵循“背襯先於顯體”的規則，漢語複句的主導語序也遵循這一規則。賀陽¹選取了從 14 世紀到 20 世紀初 5 部約 320 萬字的舊白話作品，統計發現：主從複句中，從句前置占總數的 88.1%，從句後置占 11.9%。這說明在書面語裡，從句在前、主句在後是漢語的優勢語序。

2.4 漢英論元角色分佈的差異

英語基於自我中心的哲學理念，立足於主體目標進行論元角色配置，跟顯體優先認知定勢吻合一致。一方面將英語的主語集中於施事、感事、致事、主事這些顯體論元角色以及非典型顯體論元角色受事的範圍內，另一方面英語顯體優先的認知定勢不但剝奪了處所、涉事、材料之類背襯論元角色充當主語的資格，而且將其排擠於句尾。顯體優先認知定勢所誘導的顯體論元角色前置優勢，是英語“主語突出”類型學論元角色分佈格局的深層動因。

漢語背襯優先，允許處所、涉事、材料之類背襯論元角色前置充當主語，擴

¹賀陽，〈漢語主從複句的語序變化與印歐語言的影響〉，《長江學術》• 4（2008）：133。

大了充當主語的論元角色範圍。以上差異，導致英語和漢語的主語選擇，以及背襯論元角色的分佈，表現出類型學差異。譬如，處所充當主語是漢語存現句的優勢語序，而處所在英語存現句中充當主語受到嚴苛的限制。這一漢英差異還擴展到存現句以外的格式。例如：

- (2) a1. 門口站著一個男孩。 a2. 一個男孩站在門口。
 b1. There stands a boy at the door. b2. A boy is standing at the door.
 b3. * At the door stands a person.
- (3) a1. 他們昨天發生了一場車禍。 a2. 昨天一場車禍發生在他們身上。
 b1. An accident happened to them yesterday.
 b2. *They happened an accident yesterday.

a 中漢語的處所和涉事可以充當主語，而 b 中英語的處所和涉事充當主語受到限制，英語以句尾為處所和涉事的常規分佈於位置，跟現代漢語正好相反。語言類型學將漢英主語選擇的上述差異，歸納為漢語主題突出和英語主語突出的類型學差異。從認知方式的角度看，這是漢英“客體導向、背襯優先”與“自我中心顯體優先”的認知定勢差異，在論元角色選擇上的體現。漢語背襯優先的認知定勢，支持處所客體作為背襯論元角色在存現句中以句首為常規、優勢語序；英語顯體優先的認知定勢，不但不允許處所背襯成分自由充當主語，而且還將處所論元角色排擠於句尾，以處所分佈於句尾為優勢語序。

文化傳播以合適的方式引導受眾瞭解漢語母語者觀察世界、表徵世界的視角，掌握組織顯體論元角色和背襯論元角色在句中分佈的總體策略，對漢英組織規則的差異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提高認知方式之間的對接和轉換。

2.5 比率的中英認知方式差異

整體是背襯，部分是顯體。在背襯優先認知定勢的誘導下，中文立足於整體觀察和表徵比率，英語立足於部分觀察和表徵比率：

中文：	英文：
五分之一	one fifth
百分之十	ten percent

2.6 打折的中英認知方式差異

消費的目標是付出較低成本獲得較高收益。同理，打折扣是消費者付出的成

本和收益之間的比率。計算折扣至少有兩種視角。一種是立足於付出的成本看收益目標，另一種是立足於收益看成本。成本是背襯，收益是顯體。在背襯優先認知定勢的誘導下，中文立足於成本理解和界定折扣；在顯體優先認知定勢誘導下，英語立足於收益理解和界定折扣。如果成本和收益只出現一個，漢語選擇成本，英語選擇獲益。這就是為什麼漢語的“七折”，對應著英語的 30% off。



圖 1：商鋪廣告中的漢英折扣對比

2.7 空間方向認知表徵的漢英差異

空間方向的認知，可以分為序列自身參照和主體行旅隱喻參照兩種模式。序列自身根據首前尾後確定方向；主體行旅隱喻根據行旅者的朝向或行進方向確定前後。漢語基於客體導向哲學理念，背襯優先的認知方式在空間方向上將序列客體作為方向參照的優先選項，需要較高的條件才能啟動主體參照認知模式。主體行旅參照模式缺乏獨立性，導致英語雖然也可以將客體序列作為方向參照框架，跟漢語一樣都將靠近封面位置的“前言”稱為 foreword，靠近封底位置的“後記”稱為 afterword，然而，英語顯體優先認知定勢對主體參照的誘導強度遠高於漢語，導致英語的主體參照模式更容易被啟動，在頁碼序列與翻動頁碼的手指處於相對移動的情況下，英語對頁碼的描述，則跟漢語呈現出顯著差異。

英語：基於觀察者行旅隱喻，起點在後，目標在前forward



漢語：基於序列，首在前，尾在後

圖2：行旅參照框架和序列參照框架對比

翻動頁碼的過程包含兩個相對移動的過程同步進行。一方面頁碼客體的自身序列在更替移動，同時也可以看作主體（人和手）在頁碼序列中向著目標移動，翻頁的常規目標是從封面移動到封底。換言之，翻頁移動包含主、客兩個相對移

動過程，如果優先關注頁碼客體自身序列不斷更替的進程，這種認知模式啟動“首前尾後”客體序列內參定向參照模式，以書本的封面為前，封底為後；如果優先關注主體手指在頁碼序列中朝著終點目標封底前行的進程，這一認知模式啟動主體行旅定向參照模式，以向著封底移動為前，封面為後。在翻動頁碼活動中，客體序列定向模式與主體行旅目標定向模式兩種認知模式並存。但一種語言選擇其中的一種作為常規認知定勢。這種情況下，漢英的認知方式的差異就顯現出來了。

“客體導向、背襯優先”的中國式認知方式，誘導漢語母語者優先選擇客體序列定向模式來看待翻頁，根據“首前尾後”客體序列內參定向參照模式，以書本的封面為前，封底為後，因此向著封底方向翻頁在漢語中就是向後翻。基於“人是度量萬物的尺度”哲學觀的“目標顯體優先”英語認知方式，誘導英語母語者優先選擇翻頁主體手指在頁碼旅途中向著封底進發來確定方向，根據“目標在前、起點在後”的主體外參定向，翻頁的常規目標方向指向封底，因此封底在前，封面在後，因此向著封底方向翻頁在英語中就是向前翻（turn forward）。

漢英空間方向認知的差異是有條件的，漢語並非無條件地排斥行旅方向認知模式。這個條件就是，漢英啟動行旅定向模式的“臨界點”不同。翻動頁碼，沒有出現翻頁者的朝向，也沒有出現當事人身體的整體移動，只是手指和頁碼相對移動。因此，在漢語看來，僅僅手指在頁碼序列中移動，未出現翻頁者身體整體移動，缺乏行旅模式必要的構成要件，不足以達到啟動行旅定向模式的臨界點，不能歸為行旅活動。然而，頁碼序列首尾銜接有序，具備完整的首尾序列結構，符合典型的序列定向模式標準，所以漢語將翻頁方向歸入“首前尾後”序列自身內在定向模式來確定翻頁方向。

在漢語看來，頁碼序列的先後自身呈現出內在的方向，無需再參照外在看不見摸不著的行旅模式給翻頁定向作參照，頁碼客體內在序列構成的先後方向比行旅隱喻模式更適宜定向。在行旅模式和序列模式兩種模式並存的情況下，漢語在“客體導向、背襯優先”認知定勢的誘導下，傾向於優先選取頁碼客體內在序列“首前尾後”來參照定向，而遮罩基於主體目標的外在參照定向。儘管沒有出現翻頁者的朝向，也沒有出現翻頁者的身體整體移動，只是手指和頁碼在移動優先啟動行旅模式，在行旅特徵不足、缺乏典型行旅要件的情況下，英語在“自我中心、目標顯體優先”的認知定勢支配誘導下，仍能誘導、啟動行旅定向模式。在英語

看來，翻頁出現移動方向，而移動的主體是翻頁者，移動的目標指向位於前方的封底，而移動的起始點（封皮）位於移動者的後方。

可見，漢英“客體導向”與“主體導向”在行旅模式缺乏典型性而模稜兩可的情況下，各自啟動客體序列、行旅模式。一個是遮罩、弱化行旅模式，一個是誘導、強化行旅模式。漢英啟動行旅定向模式臨界點不同，原因在於各自的客體內參導向、主體外參導向優勢認知模式不同。漢語和英語空間方向認知不一致是有條件的，而這個條件跟各自的認知定勢有關，最終取決於各自的哲學觀差異。

2.8 時間方向認知表徵的漢英差異

跟空間方向類似，時間方向的認知也分為時序自身參照和主體行旅隱喻參照兩種模式。時序自身根據先者在前、遲者在後確定方向；主體行旅隱喻根據行旅者的朝向或行進方向確定前後。但是，漢語和英語啟動時序模式和行旅模式的條件有同也有異。例如：

（4）In the weeks ahead of us...(future) （今後的幾周）

（5）That's all behind us now...(past) （那都是往事了）

第二種，未來在後面，過去在前方：

（6）In the following weeks...(future) （今後的幾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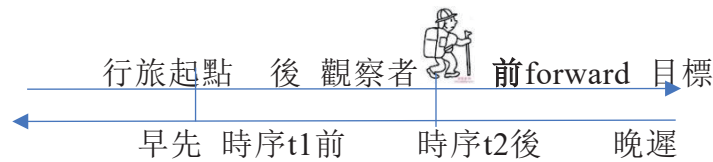
（7）In the preceding weeks...(past) （前幾周）

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時序方向隱喻還可能混合在一起，如：

（8）We are looking ahead to the following weeks. （我們正在展望今後的幾周）

（4）和（5）是立足於觀察朝向而得出“過去”在觀察者後面、“將來”在觀察者前面的方向。而（6）和（7）立足於時序自身“先者在前”原則得出未來在時序的後面。（8）將“未來在前”的觀察朝向跟時序自身“早先在前”方向混搭在一起。

英語：基於觀察者行旅隱喻，起點（早先）在後，目標（晚遲）在前forward



漢語：基於時序，早先在前，晚遲在後

圖3：行旅參照框架和時序參照框架對比

在時序客體參照和觀察者主體參照主、客兩種參照框架混搭的情況下，漢語有兩種處理方式。如果語境中出現了時量，由於時量是從時序中測量出來的，因此漢語將其轉換為時序方向，例如（8）和（9）。（8）中英語出現了觀察方向（*looking ahead*）和時序方向（*following*），而漢語則遮蔽、架空了觀察方向，保留了時序方向。（9）中儘管“展望”顯示出觀察的朝向為“前”，但（9）a1 中漢語“10 年”所修飾的方向卻是“後”，採用的是時序“早先為前”的序列參照，此處觀察者面對的“前”對應著“10 年”所處的時間序列方向“後”。

（9）a1 合格而（9）a2 不合格，因為“前景”所顯示的觀察方向，處於時序方向“後”的位置，而“10 年”是根據時序計算出的，其方向依據時序來定向，所以此處展望的是“10 年後”的“前景”而非“10 年前”的“前景”。（9）a2 不合格的原因，是“10 年前”作為時序方向的“前”，在觀察“展望”的反方向——“後”方，跟觀察朝向“展望”的“前景”發生衝突，如果觀察方向不向強勢的時序參照方向做出讓步，句子就不合格。這證明，時序模式在漢語中佔據優勢地位，架空主體方向參照，導致不獨立的主體參照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

換言之，（9a）與（9）b 中一旦出現暗示時序參照的時量資訊，時序方向就架空“展望、前景”的觀察朝向。反觀英語，（9c）立足於觀察者的朝向表達時間方向。從這個意義來說，漢語屬於“時序參照優先型”語言，英語屬於“自我參照優先型”語言，導致英語中基於主體觀察得出的方向，在語境中出現時量資訊時，只能轉化為時序方向才符合漢語的時間方向認知。例如（9a）和（9b）中的時量“10 年”。時序是漢語時間方向的優勢參照框架，也是漢語跟英語時間方向差異所在。與此類似，（9）b1 和（9）b2 中的“回顧”從觀察者的另一個方向驗證了“回顧”和“前景”表示的基於主體朝向的方向被時序方向所架空。“回顧”和“前景”的方向只能轉換為時序方向。反觀（9c）和（9d），*forward* 所對應的是漢語

的“後”而不是“前”；back 所對應的是漢語的“前”而不是“後”。漢語以時間序列自身方向為參照框架，參照時間自身“早先在前”定向，與英語中以主體方向為參照框架得出的方向恰好相反，除非英語中也同樣採用時序作為時間方向的參照框架。

(9) a1. 展望 10 年後的發展前景。 a2.*展望 10 年前的發展前景。

b1. 回顧 10 年前的往事。 b2.*回顧 10 年後的往事。

c.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10 years.

d. Look back on the past ten years.

2.9 敘事方式的漢英差異

“來源-去向”雙向敘事與“去向”單向敘事方式

在翻譯中面臨中外認知方式的對接與轉換的挑戰。在確保文化自主的同時，在技術上應充分考慮能否實現中外認知方式的跨文化對接和轉換。

“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最初英譯“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後來改為“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其中 destiny 變為 future。其理據在於，“命運”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前緣註定的“命”，指向前緣——背襯來源，另一個是未來的“運”，指向未來目標去向。

中文“背襯優先型”認知方式優先關注來源，立足於以往的命數看待未來的機運；而源於古希臘的歐美文化則是目標優先，立足於未來（future）機運看待命數。漢語背襯來源優先和英語未來目標優先兩種認知方式，引導漢語和英語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的認知導向不同，漢語將 destiny 置於前臺，英語將 future 置於前臺。在翻譯中如果不進行對接和轉換，會導致翻譯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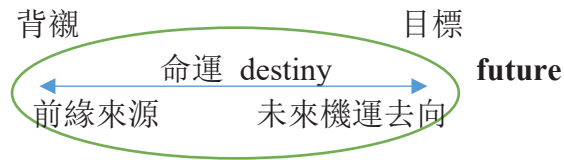


圖 4: “命運”和“destiny”及“future”的關係

如果撇開不同文化認知方式的偏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意，是宣導世界各國“同舟共濟攜手合作共創美好未來”，將最初英譯中的“destiny”替換為“future”，更符合歐美“目標優先”認知方式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考慮到跨文化認知方式的差異，為更加方便和貼近國外受眾的理解，從漢語的背襯來源型認知方式轉換為目標去向型認知方式。因此，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改為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這是跨文化傳播遵循認知方式差異的內在規律而進行調適轉換的結果。

中國傳統小說、戲劇的人物出場，大多介紹出場人物的家世背景等來源地資訊。而西方小說、戲劇，則將這些資訊散佈於人物關係、情節展開、故事發展的脈絡中透露出來。中國傳統小說更傾向於以時空背景引出故事情節和主人公。《紅樓夢》將故事的時空背景設置於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遺棄於大荒山無稽崖下的靈通寶玉投胎人間這一宏闊的歷史場景，引出男女主人公在赤霞宮神瑛侍者靈河岸灌溉三生石畔絳珠仙草，後者投胎人間以淚水償還甘露澆灌的前世之緣，再通過空空道人引出風流今生。以時間順序安排敘事，是中國傳統小說乃至當今文學敘事的主流。歐美小說，更喜歡根據故事推進的需要，打破時空穿插敘事，是歐美小說、電影的慣用敘事手法。

主客和合的認知方式，還影響到社交禮儀。中國式社交禮儀，除了敬稱如“貴姓、大作”之外，還可借助於降低自身姿態的謙稱來抬舉對方，如“敝姓、拙作”。做報告或是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懇請對方批評指正。英語基於自我中心的理念，抬高對方卻不會降低自身姿態。空間方向、時間方向、語序、打折、姓和名的順序、敘事方式、社交禮儀，語言內外的不同領域，都證明中國式認知方式跟英語認知方式之間在不同領域，都呈現出主客和合、背襯優先和自我中心、顯體優先的差異。

三. 跨文化中外認知方式的競合與對接

從跨文化認知方式轉換的角度看，語言之間的翻譯涉及兩種基本模式：歸化（domestication）翻譯法和異化（foreignization）翻譯法。

歸化翻譯法將源語本土化，儘量遷就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識儲備、審美特點，採取其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內容。歸化翻譯法的優點是有助於讀者以自身熟悉的民族文化來理解譯文，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其代價是喪失原作獨有的文化價值取向和韻味。

異化翻譯法盡可能不改變原作品所植根的民族文化的蘊涵和價值取向，引導讀者向作品的民族文化系統靠攏，反映異域民族特徵和語言風格特色，突出異國情調及其民族文化意蘊。然而，如何兼顧雙重認知方式和文化特色，在中外認知方式和文化之間走鋼絲，這對翻譯的技巧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少數兼顧雙重認知方式和文化特色的“歸化-異化”創新性翻譯，既貼近讀者認知方式，又保留異域文化的意蘊，成為翻譯創新的佳話。被世界主流媒體廣泛使用的中國宇航員 taikonaut 中，前半段取自漢語 taiko（太空），後半段來自英語 astronaut。astronaut 由源自希臘語的 astro（星星）和 naut（水手、船員）兩個語素合成。

中文和中國文化傳播中，中外認知方式對接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中外認知方式在競爭中的合作關係，如何處理好競爭與合作中的中國式認知方式的最大化。具體而言，如何在兼顧其他文化認知方式的同時，最大程度地保留中國式認知方式及其文化基因。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傳播中，不同認知方式的競合關係和地位，跟經濟、文化的消長變化密切關聯，處於動態的變動狀態。譬如，在跨文化傳播的媒體中，中國人的姓和名是採用拼音轉寫，還是採用其他語言轉寫；是姓前置還是名前置，就反映出中國式認知方式在競合中的地位。

中文的姓和名，是姓在先，名在後，而英語等印歐語相反。《時代》週刊在不同時代對鄧小平英文名字的拼寫方式，顯示出歷史性變化。1972、1976、1978、1979、1980 年，該刊封面都將鄧小平拼寫為 Teng Hsiao-ping¹，英化痕跡明顯。自 1983 年起，該刊封面上採用中文拼音拼寫：Deng Xiaoping 拼寫“鄧小平”，並在此後的 1985、1986、1997 年的封面上持續使用。西方媒體對中國人姓

¹ 〈《時代》週刊封面上的鄧小平〉，群眾網，2014 年 10 月 19 日，http://m.qunz.com/qzxlk/dzxt/2014/ckh/202011/t20201104_84778.html，訪問時間：2023 年 10 月 5 日。

名的拼寫變化，折射出從立足於西方看中國，到立足於中國看中國，這是中西認知方式對接轉換的一大步。時至今日，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人姓名的拼寫，都採用中文拼音的方式。拼音本身也是中文與羅馬字母相結合的產物，以拼音來紀錄中文姓名，是中西認知方式對接的典範。而拼音以“姓+名”的順序紀錄中文姓名，則既能實現中外認知方式最大程度對接，又確保中國式認知方式和文化特色最大程度得以保留。

跨文化認知方式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在彼此兼顧中達成動態的平衡，過猶不及。淡化自主固不可取，但揠苗助長往往影響傳播效果。在技術層面上，競合關係中的中國式認知方式最大化，要分階段、分領域，因地制宜，因勢利導。譬如，中國龍的英譯，既有“dragon”和“serpent”這樣的意譯，也有“lounɡ”和“loong”這樣的音譯。然而，30 年前一場譯龍大論爭，讓國人乃至世界看清了龍跟“dragon”的文化差異，代之而起的“loong”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世界主流互聯網詞典，都設立了“loong”的詞條。究其原因，“loong”跟中文拼音和廣為熟知的拉丁文拼寫都極為接近。外國人看著眼熟，像是拉丁文新詞；中國人聽起來音節拉長，像中文拼音。這一融通中西的“漢化拉丁詞”，超越“dragon”架起一座通往“龍”的文化內涵的橋樑，最大程度對接中外認知方式。既未放棄文化自主，又克服了文字隔閡帶來的跨文化傳播自言自語、水土不服的問題。

“背襯優先”的認知方式貫穿於中國語言和文化各個層面。漢語姓和名的排列順序、語序、中國式敘事方式、交際禮儀等現象，都體現出背襯優先及其主客和合、客體導向的哲學基礎。借助於認知方式的調適，既貼近跨文化受眾的認知方式，又充分體現認知方式和文化特色，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切實提高跨文化傳播的效果。

（作者單位：澳門大學）

Author Affili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